

同治年間陝甘回民事變中的 主要戰役

李 恩 涵

清季同治年間我國西北地區所發生的回民變亂，是一件事態嚴重的大事件，與約略同時期所發生的太平天國、捻亂等革命事件相比較，雖然在反抗滿清政權的立場上相類似，但在性質上頗不相同，因為西北回民事變不只牽涉到西北少數民族與漢民族關係的問題，也牽涉到國家領土主權完整的問題。此一變亂所涉及的地區廣大，包括現今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等省區，而在時間上則從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春變亂發生開始，一直到光緒三年底（一八七八年初）新疆南部各城全被勘定為止，則經歷了大約十六年之久；其間於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七年間浩罕王子阿古柏（Yakoob Beg）甚至在天山南北路成立一獨立政權，並受到英、俄諸帝國主義列強的支持與間接承認。^①所以，當回亂最盛時，對華具有陰謀與野心的西方人即曾預測，西北回民的變亂與同時期在雲南所發生的回民事變（一八五六—一八七三）甚有互相結合而形成一橫跨我國西北、西南半壁山河的回教大帝國的可能。^②因此，陝甘總督左宗棠利用大約十年時間（一八六八—一八七八）所敕平解決的此一變亂，不只在對內消除反側鞏固清廷統治方面有其貢獻，對於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尤有其正面的不可磨滅的勳績。本文所擬討論的，只是此一回民事變在陝、甘兩省發生的背景及在變亂平定過程中的幾次主要戰役。此外，對於左宗棠安輯回民及解決變亂善後諸政策，也將略為涉及。

① 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重慶商務，民國卅四年）；Wen-Djang Chu（朱文長），*The Moslem Rebellion in Northwest China, 1862-1878: A Study of Government Minority Policy*（The Hague, 1966）；包爾漢：論阿古柏政權（歷史研究，一九五八年三期），頁一一—七。

② Marshall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 A Neglected Problems*（London, 1910），p. 158；有關雲南回亂發生的原因及平定的經過，參閱王樹槐：咸同雲南回民事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民國五十九年）。

我國的陝西、甘肅（在清季其政區包括今之寧夏與青海）兩省自唐代中葉以後，即為漢、回兩族雜居的地區，大致在清季同治年間回亂以前，陝西居民為漢七回三，甘肅則漢三回七；但在大動亂中，由於雙方的互相屠殺，不只對當地社會、經濟、文化的破壞，是鉅創深痛，難予估計，兩省內兩族人口的結構亦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就人口的損失而言，各家估計頗不相同：英人貝爾（Colonel Bell）曾估計甘肅亂前的人口約為一千五百萬，亂後人口則銳減至一百萬人，境內漢人十分之九，回人三分之二均被屠殺；^③ 基督教士英人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s）的估計數字則較低，認為在整個同治年間的西北回亂中約有一千萬人喪失生命。^④ 我國公私文獻中雖無具體的統計數字，但零星資料所載，已足令人觸目心驚，如記甘肅慶陽府及涇州各屬六城，在大亂之後，除崇信一城「尚有居民，餘皆空城，人烟斷絕」，慶陽府城之「衙署倉庫廬舍蕩然無存」；^⑤ 秦州府屬各城則「赤地千里，無復人烟」。^⑥ 平涼為甘肅中部的大城市，亂前只城內漢民即達數萬，但在戰亂中為回軍穆生花部攻陷，大肆屠戮，亂後漢民全郡只存一四七戶，男女老弱合計不及七百人，「城垣空濶，城內一片瓦礫」，全境「縱橫數百里，烟火寂然，而白骨黃茅彌望皆是，遺黎泣訴，被禍之烈，為古今所未有」。^⑦ 甘肅北路寧夏環慶一帶，「殘破以來，千里白骨黃沙，人烟闕寂，文報難通」；^⑧ 附近的固原州城，於回軍戰敗北徙時，城內所留漢人不過十數人。靈州為寧夏境內的最大城市，經回軍攻破後，漢人十萬多慘被屠殺，該城最後為左宗棠軍克復後，漢民存者不過數家，其財產婦女均為回軍掠奪，「老弱死亡，壯丁為其僱工細雇」。^⑨ 在回民人口的損失方面，甘肅西部本為回人聚居地區，人數繁多，亂後則安西、甘州、涼州、肅州一帶二千餘里，竟無回族聚落，左宗棠於平亂後上奏說，「肅州實無一回羸雜，其甘州、涼州各回死亡殆盡，亦無遺種」，「實漢唐以來未有之奇」；^⑩ 可見甘肅回民在此一大動亂中所遭受損失的慘重情形。陝西回漢兩方面在互爭中亦殺戮奇慘，漢人村堡被回軍攻陷後，往往「殘殺幾無噍類」；^⑪ 同治元年七月廿五日回軍攻陷西安

③ Broomhall, *op. cit.*, pp. 155, 162; Chu, *op. cit.*, preface.

④ 左文襄公全集（光緒十六年刻本，此後簡稱「左集」）奏稿卷卅一，頁六十三。

⑤ 左集，奏稿卷卅四，頁四十一上；卷卅八，頁五十三上。

⑥ 雷正綰編，多忠勇公（隆阿）勤勞錄卷四（見白壽彝編，回民起義，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一九五三年；第四冊，頁二九〇）；左集，奏稿卷卅一，頁六三上、下。

⑦ 左集，奏稿，卷卅四，頁四一上；卷卅八，頁五三上。

⑧ 同上，卷卅三，頁十五下。

⑨ 同書，卷卅四，頁十二；卷四一，頁五三。

⑩ 同書，卷四四；頁卅一；李岳瑞，春冰室野集，卷一，「左文襄遺議」。

⑪ 余樹勳，秦隴回務編略卷一（回民起義，冊四，頁二一九）。

省城附近的村堡後，屠殺漢民萬餘人，只是許多大屠殺的例子之一，而鳳翔府漢民團練亦突然閉城，將城內回衆悉數殺死。^⑫ 所以，在大亂蔓延後，即在素稱饒富爲人文淵藪的關中平原，也大部成爲廢墟，「數百里無行人」。^⑬ 據一項粗略的估計，在整個變亂中陝西各州縣漢民被殺者當有一百萬之多，而在戰爭中陝西各縣回人七、八十萬舉族向西遷徙，在變亂平定後，除西安城內留居的回民二、三萬人及回軍領袖之一白彥虎所率二千多人逃往新疆（後又自新疆逃入俄境）之外，最後只遺留下六萬多人於投降後被安置於甘肅平涼、涼州等地境內墾荒，「其死於兵戈疾疫饑饉者蓋十之九」。^⑭ 因此，此次回民事變對陝、甘兩省人口、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破壞程度，不只遠較太平天國與捻軍對華南、華中、華北各省的破壞爲嚴重，亦較之雲南回變在人口的損失上爲多。^⑮

陝甘回變發生的原因，追本溯源，是清政府對待西北少數民族政策的失敗，因爲許多歷史傳統所遺留下來的問題，都常因清政府政策的不良與失敗，而變得愈爲嚴重。陝、甘回族在種族上固然甚爲複雜，或爲東來中亞人的後裔而滲雜有漢人的血統，但高體隆鼻，與普通漢人在體型外貌上有相當的分別；或爲原漢人而改宗回教者的後裔，而與當地漢人在體質面貌上無何軒輊；但因漢、回宗教傳統的不同，彼此間在社會習俗（如不拜偶像除極少數新教徒外不燒香）與生活習慣（如回人不食豬肉，漢人農民不食牛肉）上有相當的歧異，因此，互不通婚，甚至互相輕視，漢回人民常常分區集體居住，漢村回堡，此疆彼界，非常嚴格；加之清廷對於西北回民的政策，一向偏採嚴峻的對策，以回制回，而對各省內地回民的統治政策，在立法與實際行政上亦遠較對漢民爲嚴峻，而且由於絕對多數的地方官都是漢人，在有關漢回兩族人民的訴訟案件中，更多畸輕畸重，對於回民常多壓抑，回民因此常生反抗之心，零星衝突更時有所聞；都是促成在同一地區內漢、回兩類不同社區間難以水乳交融的基本遠因。彼此之間的怨恨集累既久，即自然形成互相疑忌互相對立的兩個集團，平時雙方的和平相處即相當不易，釁端一起，往往便極易形成一相

⑫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臺北，民國五十二年），上册，頁四〇五；秦隴回務紀略卷二「回民起義册四，頁二二二—二三）。

⑬ 多忠勇公勤勞錄卷三（回民起義册四，頁二八七）。

⑭ 左文襄公年譜（臺北文海翻印本），卷五，頁三四；左集，奏稿卷四四——頁五二；Wen-Djang Chu. *op. cit.*, 70.

⑮ 王樹槐在所著咸同雲南回民事變一書中估計，在延續十八年之久的雲南回亂中，可能有四百五十萬至五百萬人死亡或逃離滇省（頁三一四—一五）。

當規模的暴亂。¹⁶所以，漢回衝突的開始，雖肇始於一些微末零星的事件，但堅冰履霜，其根源卻在於清政府多年來對待少數民族錯誤的政策上。

另外，從回教集團的本身而言，由於西北地區自乾隆後承平已久，至嘉慶、道光年間，過去在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四）後曾經兩度造反過的回教新教，又死灰復燃，¹⁷而在咸豐、同治時期即以雄據寧夏靈州金積堡的馬化龍（隆）為教首，馬氏自稱「總大阿訇」，常「自託神靈，妄言禍福，行為詭僻」，不少回民對之尊崇備至，而自稱「吾兩目」（奴才）；顯然有逐漸形成一對整個西北回民的領導中心的趨勢；¹⁸時機到來，自極易轉變為對清廷公開的反抗。而同治元年（一八六二）三月，太平軍扶王陳得才、遵王賴文光等部萬餘人為牽制清軍對廬州（英王陳玉成）及南京的進攻，自河南西南部攻入陝西，連克鎮安、孝義等縣；是年四月，捻軍張宗禹部亦進兵陝南，與太平軍相會合；一個月之後，原在雲南昭通起事轉戰四川各地的藍大順（後受太平天國之封為端王），亦揮軍自四川太平北據陝西定遠；因此，戰事蔓延陝西：使原來局面尚稱小康的西北地區，頓時陷於擾攘不安之境。¹⁹這種情勢正是促成陝、甘兩省漢、回衝突的一項新因素。

為了防禦太平軍及藍大順部的進襲，陝西各地即普遍建立團練自衛，漢回各自立團，各有碉卡城堡，聚屯自守，漢莊回寨，咫尺相望，雙方涇渭分明。回人團練，因人數較少，其領袖中之有野心者常常聲氣互通，加上「天下的回教一家親」

¹⁶ 王樹槐對雲南回民事變發生之遠因的分析，甚為細緻，其所述的幾種因素，亦同樣可適用於分析陝、甘回民事變爆發的遠因，見前書，頁四七——五〇、五九——八〇。回漢人間不同的風俗習慣，除回人不崇拜偶像，不燒香，不吃豬肉，而漢民則最喜燒香禮拜，嗜食豬肉但禁食牛肉等外，在陝甘地區有最易引起雙方衝突的一項回人風俗則為「放青」。「放青」即牧放牛羊於田野，任其所之，可使牛羊迅速生長體軀肥大，但此野牧的牛羊，對於漢民辛苦種植的農谷却常造成很大的損失，因五穀被羊牛所食及農田被牛羊所踐踏之故。當地政府常規定節逾冬至即不准擅放牛羊，而回民常常不遵，因此漢回之間，常為此而械鬪（回民起義，第四冊，頁二一五——一六。）

¹⁷ 回教新派的興起，始自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當時馬明心、馬四十三由西域留居歸來，自稱得天方不傳之秘，創立新教，圖謀反抗清廷，旋經討平。但三年後的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新教回民在田七領導下，再起反抗，但又被清廷派遣大軍剿平。實際新教的教義與教規與舊教並無不同，只是在某些禮儀方面，如老教誦經則合掌向上，新教則兩掌向下而不合；老教端坐誦經，新教駢誦，喇吧頭搖而肩聳；老教送葬不脫鞋，新教則脫鞋。（見左集奏稿卷冊八，頁六二——五）；此外，在生活習慣上，老教非常保守，主張生活簡單儉約，新教徒的態度較開明，有些人種植鴉片，甚至有吸食鴉片者，新教徒對當地漢人的習慣風俗，亦較傾向於接受與調和，有些甚至採用佛教或道教的燒香儀式於回教的禮拜中。此等風俗習慣的變改，均為舊教徒所最痛恨而鄙視者，因此，兩派的衝突時常發生（見Marshall Broomhall, *Islam in China*, pp. 161, 253-4.）

¹⁸ 左集，奏稿，卷冊三，頁卅五——六；卷冊八，頁六二——五。

¹⁹ 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臺北商務影印版，民國五十四年），頁三九五、三九七、四〇〇。

南倉頭鎮，並乘機煽動當地回民造反。^{②⑨} 領導陝西回軍作戰的，多為回教「阿衡」（教長），但各不相下，並無最高的領袖。起事之初，號稱有「十八大營」，營首為任（老）五、鄒玉龍、關阿洪、赫明堂、郭二阿洪、馮君祿、禹德彥、馬生彥、孫義保、馬振河、馬德有、藍明泰、余彥祿、于振奎、白彥虎等。^{③⑩} 叛亂早期的根據地在大荔縣境的羌白鎮與王閣村；前者位於縣城西偏南約三十里，為陝西有名的皮貨產地，交通便利，易於偵察與聯絡；後者在縣城南偏西約三十里，為古代沙苑之險要地，適於屯糧與儲餉。^{③⑪} 亂事蔓延至甘肅後，陝、甘各回軍仍然各自分立，沒有出現一個統一的領導中心與卓越不羣的領袖人物，甚至陝回各軍分黨分派，有所謂「東彌」、「西彌」之別，只在對付漢人時，才基於「天下回教一家親」的宗教精神，互相合作與支援。各地回軍領袖也無稱王稱帝之舉，只有在陝回戰敗西竄甘肅後，據有寧夏金積堡奄有寧州、靈州全境的馬化隆（龍）才自稱為「兵馬大元帥」，為託庇其境內的陝回擁為名義上的領袖。甘肅回軍各不相下，互為雄長，勢力最大的是馬化隆，其次則為河州的馬朶三、馬占鰲，西寧的馬桂源、馬本源及肅州的馬文祿。彼此之間在軍事上雖常互相支援，但在宗教上卻有新教、舊教之分，同類相仇之事時常發生。

二

陝西回亂嚴重到殺害全省團練大臣張芾的地步後，清廷乃明令剿辦，於同治元年五月十六日（一八六二、六、十二）命令荊州將軍多隆阿督辦陝西軍務，負責剿辦。多隆阿為一出色的將領，滿洲正白旗人，黑龍江駐防，原隸勝保部下，後隨同湘軍轉戰湖北、江西、安徽等省，此時適在擊潰太平天國英王陳玉成部，克復安徽廬州的重大勝利之後，奉命後，即速啓行，取道湖北、河南赴陝；^{③⑫} 但因太平軍扶王陳得才部及捻軍姜台凌部當時正縱橫進攻於豫鄂邊境一帶，多隆阿軍途中受阻，先參加了此一區域的戰鬥；清廷乃臨時改派當時在豫西洛陽一帶剿捻的欽差大臣勝保入陝，負責剿回。^{③⑬} 勝保所部多為降捻組成，號稱一萬多人，實際人數不過十分

^{②⑨} 曾毓瑜，*征西紀略*卷一（回民起義，冊三，頁廿三）；單化普輯「陝甘劫餘錄」，禹貢，五卷十一期，頁九七。

^{③⑩} 「陝甘劫餘錄」，頁九九。此外，楊文治、馬正和、崔偉（三）等也可能在所謂「十八大營」之內。

^{③⑪} 單化普，「說陝甘回亂初起時之地理關係」。

^{③⑫} 費行簡，*近世名人傳*（臺北文海翻印本），頁三二七—二八；*清史*卷四〇四，列傳一九〇。

^{③⑬} *征回紀略*卷一（回民起義，冊三，頁二二—二五；郭廷以，*太平天國史事日誌*，頁九〇六、九二〇、九二三、九二六。

之七，戰鬪力與紀律均差；奉到入陝之命後，遲遲一個月至同治元年八月才進入陝境，距離回亂的爆發已近五個月之久；而在進入陝西的第一仗華陰之役，其前鋒即為回軍擊敗，損失不少輜重軍火。稍後，在西安附近的壩橋之戰，又再失利，甚至降擒宋景詩竟中途率部叛離而去，而勝保在奏報中則自稱「八戰八捷」。^{③④}清廷因此再度旨命多隆阿入陝，由勝保負責剿攻陝西之回，多隆阿負責剿辦甘肅之回。但勝保的軍力實際不能制回，又妬忌多隆阿的兵威，乃未經奏准即擅自征調時降時叛的皖北民團苗沛霖部入陝，清廷因恐苗部入陝後極可能與回軍聯合造反，嚴旨申斥勝保，甚至不惜派兵阻止。^{③⑤}所以，在多隆阿軍於同治元年十一月進駐陝西潼關後，清廷即下令逮捕勝保，解北京訊辦，此後陝境剿回事即專由多隆阿負責辦理。^{③⑥}

多隆阿所部多為南勇，作戰時軍律森嚴而戰鬪力極強，同治二年初，他於抵陝布置稍為就緒後，即決定攻堅之策，率部進攻關中地區陝回的根據地同州的羗白鎮與王閣村。兩地都是防守嚴密的重要據點，周圍均築有長濠，「橫寬丈餘，直深倍之」，而前者「堡砦壁立千仞，鹿角豚柵密排數道，周圍繞以棘刺，砲臺警樓高聳碧落」，^{③⑦}尤稱堅壘。多隆阿決定給予回軍一次致命的打擊後，即下令集中全軍馬步精銳進攻，進展迅速，於是年二月一日（三、十九）即一鼓作氣將兩地克復，屠殺回民無算，並在回軍地窟中獲銀三十萬兩，^{③⑧}為陝回起事後第一次受到真正的痛懲。同年九月，復再攻克回軍在渭河流域的另兩個根據地蘇家溝與渭城灣，斃敵一萬七、八千人之多，其戰果更超過攻克羗白鎮與王閣村之役，為入陝後最大的一次軍事勝利。^{③⑨}至此所有渭河南北的回軍重鎮已悉被收平，回軍殘餘各部被迫向西遷徙，陝西境內已大致肅清，回亂重心開始轉移至甘肅。可惜多隆阿雖然勇敢善戰，但他本人卻不幸於同治三年二月在指揮進攻川匪（太平軍）藍大順部所據的盤尾時，頭部中槍受傷，拖延月餘而死。^{④⑩}剿回的重任，朝命改由在攻剿太平軍中建立大功的湘軍水師統帥楊岳斌以陝甘總督的身份擔任。楊岳斌之出任陝甘總督為一異數，可見清廷對陝甘回亂的蔓延與發展感到無比的焦慮。因為依照慣例，陝甘總

^{③④} 清史，卷四〇四，列傳一九〇；平定關隴紀略卷一）回民起義，冊三、頁二六四、二六七；郭廷以，前書，頁九二七。

^{③⑤} 清史，卷四一〇，列傳一九六；郭廷以，前書，頁九三七。

^{③⑥} 同上註。

^{③⑦} 近世名人傳，頁二三七——八；多忠勇公勤勞錄，卷四（回民起義冊四，頁二九一——五）。

^{③⑧} 清史，卷四一〇，列傳一九六；多忠勇公勤勞錄卷四（回民起義，冊四，頁二九一——二九二）。

^{③⑨} 多忠勇公勤勞錄卷四（回民起義，冊四，頁二九九）。

^{④⑩} 同上書，卷四（回民起義，冊四，頁三〇一——二）；征西紀略卷一（回民起義，冊三（頁二五））。

的心理，每成聯合之勢；漢人團練則各自為政，力量渙散。惟間中也有漢團團首由於平日漢回間的不協，慣常大言炎炎，以「剿回」、「滅回」自許，引起回人嚴重的猜疑。另一引起漢回團練衝突的因素，為互爭財物：據說當太平軍（一說川匪，似誤）攻陷西安附近的渭南城後，鄰縣華州回團曾越境支援，並收復該城，因此函獲了不少太平軍遺留的輜重財物；漢團妬忌，要求分潤，回團拒之，因此，雙方鬧得極不愉快。^②

不久，即發生渭南孝義鎮回團在華州砍竹被殺的事件。此批肇事回團主要係由河南巡撫嚴樹森所遣散的一批防勇所組成。嚴氏四川新繁人，而原籍陝西渭南，在湖北從胡林翼治兵多年，升任豫撫。當捻軍從皖北縱橫侵攻河南時，為防衛開封，嚴氏曾調募西安一批回軍助守，^③後因嚴氏本人調任湖北巡撫，有回勇六百餘人即被資遣回籍，轉為陝西團練大臣曾任江西巡撫及左副都御史的張芾部下，由回首趙權中統率。當時太平軍與捻軍分道進攻陝西，此批回練受命防守西安省城，後退紮渭河渡口，一行經過華州小張村時伐木為矛，竹主乃聯合當地漢民團練襲攻此批回團，殺二人，回民向本縣縣令聲訴，縣令不惟不理，反而懲處回人，回團因此不服，該團餘眾乃逃往華州回教徒聚居之秦家村糾眾報復，以「漢民將盡殲回種」相煽動；華州漢團團練也聚眾抵抗，華州回教徒乃結合男女老幼盡徙渭河以北，占據大荔縣的羌白鎮。仇回的漢團首領乃乘機煽動仇回，並赴省誣告回民叛亂，回民因而大感不安。^④

另一漢回衝突的焦點是渭南縣漢回團練的互殺。同治元年四月一日（一八六二，四、廿九、）當地回首馬世賢、馬四元即縱勇擾民，與漢民相仇殺；同州十三清真寺的「阿衡」（回教教長）也起而領導回民反抗漢人。同年四月廿二日太平軍攻陷渭南，大肆屠殺，據說即係回團引導所致。^⑤亂事自同治元年二月華州漢回團練互殺開始，由於渭河兩岸回民眾多，大家處境相同，聲氣相通，變亂很快蔓延到渭南、大荔、臨潼、華陰等縣。陝西團練大臣張芾原籍涇陽，廿六歲時即為翰林，歷任江蘇學政、工部、刑部侍郎、江西巡撫、左副都御史等職，為陝西籍京官中的

② Broomhall, *op. cit.*, p. 152.

③ 清史（臺北鉛印本，民國五十年），卷四〇〇，列傳一八六：卷四二八，列傳二一五。

④ 余樹嘯，秦隴回務紀略卷一（回民起義，冊四，頁二一五——一六）；平定關隴紀略卷一（回民起義，冊三，頁二五〇）；西田保，左宗堂と新疆問題（東京，昭和十七年），頁一五三——二。羌白鎮在大荔縣南偏西約三十里，為陝西有名之皮貨銷地（見單化普，「說陝甘回亂初起時之地理關係」，禹貢，五卷十一期，民國廿五年八月，頁九一）。

⑤ 秦隴回務紀略卷一（回民起義，冊四，頁二一六）。

佼佼者，在本省甚負鄉望。張氏幼年時，曾在臨潼、渭南交界之油坊街回村讀書，素與回教中人多有往還，為彼教所推重，故於戰亂初起後即自告奮勇，前往回亂地區招撫和解。張氏一行抵達油坊街後，談判兩日無成，再前進至渭河北岸渭南縣境的倉頭鎮，五月九日為回團中的激烈派主張造反的任（老）五、赫明堂等所執，責其統轄下的漢團殺害回人，張氏亦不稍屈，是月十三日遂被害，全身支解；同行之臨潼縣知縣繆樹本、山西知縣蔣若訥及張氏家屬在涇陽被害者五十二人，僕從死者六人；^{②④}回亂至此竟致殺戮朝廷大臣已到無法和解的階段。三日之內，臨潼、渭南兩縣境內各回莊皆叛，同州、華州繼之，關中地區南部的藍田、鄂縣，北部的高陵、富平、蒲城、涇陽、三原、耀州、同官，西部的咸陽、興平、乾州、邠州、醴泉各回村也羣起響應，大殺漢人漢官。^{②⑤}

陝西的亂事很快傳播到甘肅。甘肅回民人數原來即多於漢人，各城城內均有回民居住，且軍中回兵亦比漢兵為多。同治元年八月，陝西渭南回人到甘肅鹽茶廳煽動當地回民殺漢人；寧夏回首馬兆元亦起而掠殺漢人，並圍攻靈州城；^{②⑥}同年，甘肅北路回民中心靈州金積堡的馬化隆（龍），南路河州的馬朶三、馬占鰲，西路西寧的馬桂源、馬本源兄弟，肅州的馬文祿等紛紛而起，皆與陝回互通聲氣，互相支援，殺氛遍地，廬舍為墟，大亂一發而不可收拾。^{②⑦}

陝、甘回民的變亂，不久也蔓延到玉門關外的新疆。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四月，天山南路庫車回民開始叛亂，阿克蘇等東四城相繼被陷；是年五、六月，北路烏魯木齊回亂亦起，焚掠漢城，圍攻滿城；八月，西路的阜康、南路的和闐均被攻陷；十月，戰事延至伊犁。同治四年（一八六五）西曆三月，占據北路烏魯木齊的河州回首妥得璘甚至自稱為「清真王」，是年四月，南疆阿古柏亦從喀什噶爾占領英吉沙爾，逐漸奠定其十餘年割據天山南路的基本勢力。^{②⑧}

陝西回變的爆發，顯然很受到當時已經蔓延繼續了七年多的雲南回亂的影響，如殺害張芾的任（老）五、赫明堂，均曾參加過雲南回軍作戰，事後才潛回陝西渭

^{②④} 同上（回民起義，冊四，頁二一七——一八）；清史，卷四〇〇，列傳一八六；張芾，張文毅公奏稿（臺北文海翻印本），「國史列傳」；Broomhall, *op. ci.* p. 153.

^{②⑤} 秦隴回務紀略卷一（回民起義，冊四，頁二一八——二二〇）。

^{②⑥} 楊毓秀編，平回志卷三（回民起義，冊三，頁一〇七）。

^{②⑦} 同書卷四（回民起義，冊四，一四〇——一）；西田保，左宗棠と新疆問題，頁一五四。Wen-Djang Chu, *op. cis.*, pp.55-7.

^{②⑧} 戡定新疆記卷一（回民起義，冊四，頁三二九——三三二）；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頁四四六，四四七、四四八——九、四五四、四六二、四六四。

督向由滿人出任，漢人出督陝甘，自楊氏始。^{④①}

楊岳斌的任命雖於同治三年五月六日（一八六四、六、九）發表，但楊氏本人及親自所率領的湘軍五千人及支援人員二千人直到同治四年四月才抵達西安，是年六月，並進駐蘭州。^{④②}但楊氏在戰績上雖然表現尚好，但很快即碰到兵多糧少作戰難於為繼的困境。因為陝、甘兩省在平時和平時期即無法在財政與糧食兩方面自給自足，大部靠各省協餉，以資支撐，此次大亂之後，人民或被屠殺，或被迫流離在外，甚至關中一向繁富之區，現亦赤地千里，農業生產幾已陷於停頓，而各省的接濟，又不能及時運達；加之同治四年適值陝西大旱，弱者流離溝渠，強者挺身走險，土匪遍地蠶起，而楊氏為了應付剿回、剿匪的雙重需要，軍隊數目又須節節增加，至同治六年只甘肅的軍隊即達一百四十營八萬多人之衆；最後因此形成不只民衆缺糧，甚至士兵亦衣食不週難得一飽，這種情形，在甘肅尤其嚴重；因此，軍隊叛變之事連次發生。^{④③}如甘肅提督陶茂林部自同治二年底至同治四年夏，僅發餉兩次，每次每兵亦只獲銀一兩三錢餘，衣食之費尚難支付，因此士兵奉命自行偷谷磨成米吃，且軍官剋扣軍糧，引起士兵的怨憤，於同治四年四月全軍譁潰，從隴州竄往陝西，沿途搶掠糧食客貨，姦淫婦女。^{④④}總兵曹克忠部由靈州進攻金積堡，糧運不繼，士兵最初尚每日雜以糠粃，勉強獲得一飽，此後因草根樹皮掘盡，官兵日食麵湯，求一飽而不可得，終以饑疲力竭而戰敗，傷亡二千餘人，剩下的數千人全部譁變。^{④⑤}陝西提督雷正綰部有衆三十營，約計一萬五千人，向稱勁旅，亦因糧食不繼，士兵無意作戰而戰敗，稍後更全軍潰散，變軍甚至將所駐守的重鎮固原城交回軍之手，東向搶掠甘肅東部的平涼、慶州及陝甘邊境一帶。^{④⑥}陝甘總督楊岳斌初抵蘭州省城後，檢查省庫所存，只剩庫銀一千餘兩，作戰必用的火藥只存六兩，其窮困拮据的窘態，可想而知。而當地物價之高昂，麵粉每斤價至六十錢，後更增至九十錢，喂馬之食料每斤廿四錢至廿五錢，最貴時麥每石至七十兩，米每石至二百兩。楊氏出巡各縣，自蘭州至靖遠，有些地方甚至一斗米都找不到，居民無水無柴

④① 寶宗一，李鴻章年譜（香港友聯，一九六八），頁五九。

④② Wen-Djang Chu, *op. cit.*, pp. 76. 80.; 平定關隴紀略卷二（回民起義，冊三，頁三一七）。

④③ 楊毓秀，平回志卷四（回民起義，冊三，頁一四一）；左集，奏稿，卷廿三，頁十七、廿二——三；S. Y. Teng *The Nien Army and Their Guerrilla Warfare, 1851-1868* (Paris, 1961), p. 1961.

④④ 平定關隴紀略卷二（回民起義，冊三，；頁三一七）Wen-Djang Chu, *op. cit.*, pp. 75-86.

④⑤ 平定關隴紀略卷三（回民起義，冊三，頁三二二；Wen-Djang Chu, *op. cit.*, pp. 80, 84.

④⑥ 同上書（回民起義，冊三，頁三二四——五）；Wen-Djang Chu, *op. cit.*, pp. 80-1.

無米；^{④7}由於蘭州糧價高昂，饑民割死人肉食，後更殺人而食，城中人活存者十分之一二。^{④8}其饑困艱難之狀，實非筆墨所可形容。軍隊補給困難，甚至楊岳斌直轄的總督標營官兵亦因每月只發給雜糧數升，難得一飽，於同治四年三月三日（一八六五、四、十七）乘楊氏率兵出省剿回的時機，發生叛變，裹脅藩司、臬司、皋蘭縣知縣及總督督署及軍需局委員募友數十人，隨丁數十人、親兵十餘人等一律殺光，道員吳炳崑、翰林院侍講鍾啓峒等亦被害，所有留駐省城的楊氏親信隊伍自湖南率來的楚勇一營，亦為殺戮殆盡。變兵並與回軍聯絡，大肆搶掠蘭州附近各地。^{④9}楊氏雖然很快即率軍返回將叛亂平定，處斬了首先謀亂的一百廿三人，但他並無法解決軍民糧食匱乏的問題。^{⑤0}因此軍隊叛變的事件仍然繼續發生，剿回軍事亦無法有何大的轉機；而楊氏本人也感心力交瘁，最後不得不於同治五年八月以病請辭，清廷乃改調剛在閩粵剿平了太平軍餘黨的閩浙總督左宗棠繼任，繼續負起剿平陝甘回亂的責任；稍後，左氏並被任命為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而以其多年副手前任浙江按察使劉典，以三品卿銜幫辦軍務。^{⑤1}事實上，楊岳斌到同治六年四月才離開蘭州，在左宗棠沒有抵達接任前，由時在蘭州率軍作戰的寧夏將軍穆圖善（多隆阿舊部）暫行代理。

三

左宗棠在被派赴西北剿回之前，對於西北回亂所牽涉的一些問題，也曾注意研究過，曾在同治五年上奏建議以車戰對付回、捻軍的騎兵，「廣僱兩輪車輛倒縛砲位，間以車輛開花砲測準旋放，行則為陣，止則成營」；^{⑤2}對於甘肅缺糧缺餉兵食無從措手的問題，則建議行屯田之策，「衝衛宜用軍屯，僻地宜用民屯」。^{⑤3}及奉旨調任陝甘總督後，即以平定陝甘回亂自許，在四月十日內，將閩浙總督方面的政務全部料理清楚，即取道漢口赴陝。^{⑤4}

^{④7} Wen-Djang Chu, *op. cit.*, pp. 81-2, 84 蘭州麥價最高時每石至七十兩，但在同治六年，每石則只廿七兩（Chu, *ibid.*, p. 101）

^{④8} 平回志卷三（回民起義冊三，頁一二六）。

^{④9} 征西紀略卷一（回民起義，冊三，頁廿八）；平回志卷三（前書冊三，頁一二六）；平定關隴紀略卷三（前書，冊三，頁三三八——九）；

^{⑤0} 平回志卷三（回民起義，冊三，頁一二八）；平定關隴紀略卷三（前書冊三，頁三三八——九）。

^{⑤1} 平回志卷三（回民起義，冊三，頁一二九）。

^{⑤2} 左宗棠年譜（此後簡稱「左譜」），卷四，頁九——十。

^{⑤3} 同上註。

^{⑤4} 左集，奏稿，卷四，頁廿一。左氏奉命移督陝甘負責平定回亂之後，知此為一艱巨的任務，但他認為「天下事總要人幹，國家不可無陝甘，陝甘不可無總督，一介書生，數年兼圻，豈可避難就易哉」（左譜，卷五，頁四三）。

左宗棠隨帶前往西北的兵力原來只有原駐福建的楚軍三千人，後又合劉典在湖南新募三千人，合共六千人，計劃以此為骨幹，到陝甘後再大大擴充。⁵⁵ 後來鑒於陝甘各地經過多年戰亂，民氣荏弱，士氣民心均不適合於「精壯」「新銳」的新軍理想，乃改在漢口大肆擴充成步兵卅五營與騎兵三營，總兵力在二萬人左右；另並奏准增募吉林騎兵二千五百人及戰馬三千匹。⁵⁶ 由於當時西捻軍再度進入陝西，與回軍合流，⁵⁷ 左宗棠在戰略構想上主張先攻捻，後攻回；在對付回軍的次序上，則主張先肅清陝西之回，再平定甘肅之回，他說：「以地形論，中原為重，關隴為輕，以平賊論，剿捻宜急，剿回宜緩；以用兵次第論，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進兵陝西，必先清關外之賊，進兵甘肅，必先清陝西之賊，駐兵蘭州，必先清各路之賊」，並主張「兵精餉足」政策，以少量兵力輔以充足而源源接濟的糧餉與軍火，運用靈活，而避免楊岳斌在甘肅所遭遇的「兵多餉絀」的困境。⁵⁸ 在戰術方面，左氏主張「緩進急戰」，以穩紮穩打的方式，消滅回軍主力。另外，他也堅持他原先利用車戰多用槍砲以對付捻回軍之「衝突包抄」的構想，並主張多練騎兵，「砲車制賊馬，馬隊當步賊」。⁵⁹

為解決軍隊糧糈的問題，左宗棠在進駐西北前，即籌劃開辦屯田，此後再設立屯田總局，相度靠近軍事要隘而有水草可田可牧的地方，招集饑民耕墾，先由政府給予農具、種子、耕牛及初步救濟的賑糧等；⁶⁰ 戰鬥之餘，軍隊則利用備戰的餘暇

⁵⁵ 左集·奏稿，卷廿三，頁十一下；Wen-Djang Chu, *op. cit.*, p. 95.

⁵⁶ Chu, *op. cit.*, pp. 94, 105. 這些以「楚軍」為班底的軍隊，即左宗棠直屬的部隊，大將除幫辦軍務的劉典外，尚有高連陞（廣東提督），魏光燾（道員）、黃鼎（道員）、吳士邁（內閣中書）等。入陝後，撥歸左氏指揮的陝境原駐部隊，則有原為曾國藩所派援陝的老湘營劉松山部，原屬多隆阿的雷正綰（陝西提督）部，統軍郭寶昌部及蜀軍徐占彪（升用提督）部等。在征剿回亂的晚期進入甘肅西南部作戰後，豫軍宋慶（湖南提督）、寧夏將軍金順及嵩武軍張曜（豫軍）等亦均接受左氏的指揮與統率。在軍隊的編組方面，楚軍仍然是依照原來湘軍的建制，步兵每營五百人，連長夫共六八八八人；騎兵每營連長夫五八八八人。左軍所用的武器，步兵的制式武器仍為抬槍線槍，惟其中之六成已改用洋槍代替，後並採用由胡光墉購用之後膛七響洋槍，又大量應用大型及小型的劈山砲（迫擊砲），五人管放一尊，行軍時則置砲於獨輪戰車之上。左軍也裝備有德國最新式的後膛螺絲開花大砲；並在蘭州設立機器局，仿造西式槍砲及彈藥，以為源源接濟軍用（參閱左集，奏稿卷四四，頁六二，書牘卷九，頁十六上，卷十一，頁卅八；年譜，卷五，頁一；徐一士，一士類稿（上海，民國卅三年），頁一八二——三；王爾敏：淮軍志（臺北，民國五十六年），頁七六——八、一〇〇——一。

⁵⁷ 捻軍入陝初期係與回軍合作，後因回首馬彥魁（？）認為漢回不兩立，而捻軍首領張宗禹及其部屬，均為漢人，不可信任，乃於捻軍與清軍交戰時，襲攻捻軍，張氏大怒，乃大殺回人，此舉正贏得陝西當地漢人的擁戴（S. Y. Teng. *op. cit.*, p. 164）。

⁵⁸ 左譜，卷四，頁二十一——廿二。

⁵⁹ 同上書，卷四，頁廿三——四。

⁶⁰ 同上書，卷四，頁二十；左集書牘卷九，頁六下，

開墾荒田，至田地可以生產糧食及軍隊開拔他處後，即將此開墾過的田地交由農民耕種，至收穫有餘糧後，則由官以市價收買，「且防且剿且戰且耕，不長恃兵威為戡定（回亂）之計」。^①又因陝甘地區糧價昂貴，左氏乃責承設在漢口負責後勤總補給的「陝甘後路糧臺」購買兩湖之米，西運接濟軍食；另為解決甘肅軍需的米糧，則籌劃在四川北部嘉陵江、白水江上下游地區購糧，以水陸聯運的方式，北運陝西郿縣或寶鷄，再循陸路運入甘肅；^②至於在陝北及甘肅東北部靈、寧地區作戰部隊的軍食，則購運寧夏、山西及河套一帶的糧食接濟。^③他並開辦各省協款捐糧之例，以運糧來代替協餉。^④

對於攻剿回軍的政略方面，左宗棠首先宣布要求叛亂者投降的政策，即重申所謂「分良匪，不分漢回」，但實際他所主張的，則是一種嚴厲剿辦「先剿後撫」的政策——反對無原則地接受回軍投降，主張先用快刀斬亂麻的手段痛剿叛回，使叛亂多年未受懲創的叛回受到慘痛的懲罰之後，始可「申明神武不殺之德與怙惡必誅之威」。^⑤同治八年十月十九日（一八六九、十一、廿二）他上奏解釋此一政策的必要說：

「自來辦賊之法剿撫兼施，然回性犬羊，知畏威而不知懷德，辦理次第，與他賊正有不同，辦他賊則先剿後撫，辦回則必以撫為先；蓋回之藉為亂端者，漢與回有異視也，非宣布朝廷德意，分良匪，不分漢回，則賊有辭以脅其黨眾，則剿不勝剿，然若一於主撫，賊必以撫愚我，陰集其黨眾蠶食漢民，又將撫不可撫，竊恐漸漬既久，勢不至於雲南撫回為回所制不止。臣前疏所言攻心為上者，竊以為大局雖終歸於撫，然非俟其畏剿之極，誠心乞撫，固未可漫然允之」。^⑥

在另一件奏摺中，他又說：

「漢回構釁既深，見則必殺，良回畏解散後無以自全，匪回則以此劫持其黨，得以自固；其人柔則狡詐，剛則桀驁，知畏威而不知懷德，性與人殊，若圖導引善機，廣開生路，非須時日，俟其生路斷絕逆志潛消不可，若草草為之，撫（局）不能久也」。^⑦

① 左集，奏稿，卷四五，頁七；卷廿八，頁四九下。

② 左集，書牘卷九，頁廿六；平定關隴紀略卷十三（回民起義，冊四，頁一九一）。

③ 平定關隴紀略卷十三（回民起義，冊四，頁二〇四）。

④ 同上書，卷三十（回民起義，冊四，頁二九〇）。

⑤ 左集，奏稿卷卅二，頁十上；左譜卷四，頁卅二。

⑥ 左集，奏稿，卷卅三，頁十七。

⑦ 左譜，卷五，頁卅一——二。

決定了各項剿回的基本方略之後，同治六年五月，左宗棠即自湖北分三路進兵赴陝，一循樊城北趨潼關入陝，由其本人親率；一由紫荊關趨藍田，直達西安，由幫辦軍務三品卿銜劉典率領；一由新徵調而來的舊部廣東提督高連陞軍，泝漢水至洵陽，再經陝南赴西安；合計三路總兵力約一萬七千人，若再加先派入陝的老湘營劉松山部、皖軍郭寶昌部、道員黃鼎等，同治六年左宗棠直轄的部隊總兵力約共三萬人；⁶⁸ 計劃先嚴渭河之防，然後由陝西北向南節節壓迫竄擾陝境的西捻，俟機而一舉盡殲之於涇河、洛河之間的地區，然後再全力痛擊回軍。⁶⁹ 但捻軍進兵神速，在與左軍主力數度接觸之後，即進軍陝北，然後在陝北兵鋒東轉，於同治六年十一月乘黃河結冰轉而進入山西、直隸，北趨保定，北京大感震動，左宗棠整個剿捻的戰略，因此被迫改變，改為親率軍隊北進保衛北京，一面攔堵一面進擊捻軍於晉、直、魯各省境內，在李鴻章的淮軍及其他各輔助軍隊的協力下，一直到同治七年西捻總帥張宗禹敗死於魯北，捻亂全平，左宗棠才再由直、晉率軍重新返回陝西，於同治七年十月十三日（一八六八、十一、廿六）抵達西安，⁷⁰ 剿攻陝甘回亂的軍事布置才開始真正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當時左軍在陝西的直轄總兵力已達步軍五十五營，騎兵十五營，外加營務人員總共五萬多人，戰馬五千匹。如果包括馳紮陝北的劉松山部及川軍李輝武等部，則共達七萬多人。⁷¹ 此外駐屯榆林的寧夏副都統金順十二營及駐紮河套一帶的嵩武軍張曜、湖南提督朱慶等部尚不包括在內。⁷² 至於遠在甘肅受暫署陝甘總督穆圖善指揮的軍隊，名義上數量雖然多達一百四十營計額應為八萬多人，實際則缺額甚多，欠餉太久，或與土匪勾結，或為假投降的回軍所脅制，只能勉強維持一個局面，戰鬪力甚低，在平亂方面，談不上有何真正的作為。⁷³ 而與左軍對抗的回軍主力，則為馬正和、余彥祿、白彥虎等部，係以陝甘邊境寧州的董志原為根據地，總兵力約為廿萬，占據北至慶陽，南至郴州、鳳翔，東至鄜州，延安的地區。他們在左宗棠初抵陝西之前，即利用西捻攻擾的機會，東向攻占了不少城市，加以饑餓焚掠的土匪和因饑而潰的叛亂官兵，處處嘯聚成羣；這就是左宗棠在剿平捻亂後再返陝西後

⁶⁸ 同上書，頁廿五；左集，書牘，卷九，頁十八上，三十一上。

⁶⁹ 左譜，卷四，頁廿六；左集，書牘卷九，頁廿四上，卅二。

⁷⁰ 左譜，卷四，頁五三；參閱 S. Y. Teng, *op. cit.*, pp. 164-6.

⁷¹ 左譜，卷五，頁二；Wen-Djang Chu, *op. cit.*, p. 105. 左軍參加剿捻軍的部隊如左氏自率及劉松山、郭寶昌等部，即達三萬四千餘人，戰馬車馱逾萬（奏稿，卷廿九，頁十上）。

⁷² 左集，奏稿，卷廿九，頁卅一下。

⁷³ 同書奏稿，卷廿三，頁十四上、十七—二十。

所面對的局勢。⁷⁴

此次左氏所採取的基本戰略，仍然是原定之先肅清陝西再進軍甘肅的原則，其軍事指揮的大本營初即設於西安，以其欽差大臣的身份而發號施令，統攝全局，然後隨戰局的開展而遷移。在肅清陝西方面，他計劃在強化關中涇渭平原的控制之後，先肅清陝北的土匪與零星回軍，然後即直接進攻陝回在陝甘邊境董志原的根據地；而在解決了陝回之後，即進攻以甘肅北路金積堡為基地的馬化隆，再依次解決河州、西寧、肅州各回部，肅清關內；最後再出關摧毀天山南北路的叛亂集團，恢復整個西北地區的和平與安全。當時在陝北土匪中的大股，有董福祥、高二、扈正禧（彰）、李雙良、張萬會等，其中又有所謂老營（董福祥）、新營（扈正禧）之分，互為雄長，所部均為潰勇饑民，蟻附諸匪首而依靠劫掠為食。⁷⁵董福祥為甘肅固原人，回亂起後即以草莽英雄的身份起兵董志原，與回軍作戰，所部占據花馬池，攻掠於綏德、榆林、保安、安塞、安邊等地，有衆十餘萬，而以鎮靖堡及靖邊為根據地；高二所屬之土匪亦多至十餘萬人。⁷⁶在同一地區活動的回人土匪，則以甘肅合水之太平山及鄜州之王家角、槐樹莊為老巢，與當地漢人土匪或戰或和，而蹂躪地方則一；⁷⁷所以，陝北在大亂中情況在整個陝西最苦，軍行「所歷皆荒墟廢井，人烟斷絕」。⁷⁸左宗棠派往陝北作戰的即為在剿捻戰爭中以堅忍耐苦戰鬥力強韌著稱的老湘營劉松山部萬餘人，輔以皖軍郭寶昌部、楚軍高連陞、劉厚基等軍，合計共五、六十營，而由劉松山擔任總指揮。⁷⁹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十一月，劉軍甫自豫、晉返抵陝西，稍事整頓後，即開始進攻掃蕩，土匪扈正禧首先投降；董福祥部土匪卻與甘回相結合，進攻綏德；是年十二月四日，劉松山率全軍自永寧渡河至綏德，同月十五日，大破董福祥、李雙良、張俊各匪部，殺回軍六千，俘三千餘，解散回土匪衆二萬餘人，此役漏網而逃

⁷⁴ 同書，書牘卷九，頁卅七下；左譜，卷四，頁五三。

⁷⁵ 同書，奏稿，卷三十，頁八上，卷廿三，一下；平定關隴紀略卷十三（回民起義，冊四，頁二〇二）

⁷⁶ 左譜卷四，頁三五；陝甘劫餘錄（回民起義，冊四，頁三一四）；清史卷四五六，列傳二四二；左集，奏稿，卷三十，頁七上——八上。

⁷⁷ 左集，奏稿，卷三十，頁七上——八上。

⁷⁸ 同書，奏稿，卷三十，頁十七上。

⁷⁹ 同書，奏稿，卷三十，頁十九——廿；征西紀略卷二（回民起義，冊三，頁三十）。劉松山號壽卿，湖南湘鄉人，初隸楚勇王鑫部，王死、改從曾國藩轉戰江西、安徽等省，自統一軍，號壽字營，曾氏北上剿捻，湘將多不願從，獨松山投袂而起，立率所部渡江作戰。援剿陝西捻回之亂時，劉氏亦毅然引為己任，在左宗棠抵達陝西之前，其所部即轉戰關中平原，穩西安之防。後因捻軍東移晉、直兩省，乃在左宗棠指揮下，進擊之，為平捻左軍之主力部隊。劉軍馬步官兵均湖南人，而湘鄉籍者尤多（左奏稿卷卅四，頁六二——五，近世名人傳，頁三二六）。

者不過數千人，大小土匪頭目集中該處者幾被殲除殆盡，在短短六天之內，劉軍轉戰七百餘里，每日馳行一百三十里，擒斬數萬，擄獲軍械山積。^⑩是年十二月十八日，大軍進迫鎮靖堡，董福祥之父董世有（猷）惶懼，擬率衆歸降未定，董本人則感於劉松山威信勸降，乃決定率所部逾十萬人投降，陝北的戰局因而大定。^⑪劉松山乃收編董軍選其精銳爲三營，作爲下一步西向進攻寧夏金積堡的從屬部隊。^⑫此役劉軍所收降衆不下二、三十萬人，均從綏遠運糧予以賑濟，董軍降卒之遣散者近萬人則被安置於安定、清澗交界之瓦窰堡，墾荒地自給。^⑬

左宗棠另一進攻的初步目標則爲陝回新建的最大根據地董志原，進攻的主力包括陝安道黃鼎、蜀軍徐占彪及固原提督雷正綰等軍，由左氏親自指揮；同時再派遣另一支大軍南攻在董志原之南的環慶，以爲牽制。^⑭董志原位於陝甘之間，在行政上屬於甘肅寧州府，北接寧陽，南連邠州、鳳翔，東北達鄜州、延安，交通四達，鎔穀兩省，唐代時稱爲涇原，宋代時爲環慶，爲戰略上的形勝要地。當地人口雖少，而所築城池甚大，一向爲兵家必爭之地。^⑮所以，陝回在此集中之兵力包括甘回、滇回及漢人之被脅者，另稱「十八營」廿萬人之衆，並配備有新式洋槍，所有洋槍、火藥、戰馬等均由金積堡馬化隆自河套歸化城（歸綏）一帶販運而來，其來源則爲俄國，全力經營達四年之久。^⑯戰事開始於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二月初，回軍三、四萬人在著名強悍的回首陳林、馬正和、余彥祿等統率下，東向進攻邠州、三水，二月初八日，雙方在鎮原縣北發生遭遇戰，左軍精銳大敗回軍，殺敵一萬數千人，救出被擄漢民數千人，大大挫折了回軍的士氣。此後數日血戰，左宗棠軍強勁的戰鬥力與高昂的士氣，表現無遺，回軍的損折甚多，左軍很快進擊至慶陽，從側面威脅董志原，並截斷其西、北面的接濟後路。^⑰回軍恐慌，爲免被一網打盡，乃準備主動向北撤退，將原先的「十八大營」合併爲四大營，以其半護送眷屬輜重先經環縣、固原及白馬關向北撤退向安全地帶的金積堡，另一半則斷後掩

⑩ 左譜，卷四，頁五四——五；平回志卷二（回民起義，冊三，頁九六）；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頁五一九。

⑪ 左譜，卷四，頁五五；左集奏，三十，頁八上。

⑫ 清史，卷四五六，列傳二四二。

⑬ 平回志卷二（回民起義，冊三，頁一〇四）。

⑭ 左集，奏稿卷卅一頁四一下——四二上。

⑮ 同書，卷三十，頁六十——六二，卷卅一，頁十六——十七；陝甘規條錄（回民起義，冊四，頁三一四）

⑯ 左集，書牘卷十，頁卅六上；左奏稿，卷廿九，頁三十下。

⑰ 同書，奏稿卷三十，頁六十——六二；卷三一，頁十四——十八。

護。而左軍的進攻部隊則追逐敗敵，攻勢凌厲，很快於是年二月廿三日攻克董志原，兩天後並佔領了慶陽城。總計在此戰役中回軍戰死、餓斃及墜崖而死者二、三萬人，騾馬死斃及被擄者二萬餘匹，救出漢人難民一萬多人。回軍再一次受到了一次迅速而嚴重的打擊，為左宗棠直轄軍隊入陝以來第一次激烈而出色的戰鬥表現。⁸⁸所以，至同治八年五月，陝西境內的回軍再一次又被完全肅清，左氏的軍事指揮大本營也自西安西移至陝甘邊境的涇州瓦雲驛，以便就近指揮肅清甘肅回軍的戰事。

四

甘肅回軍的分佈，如前所述，在北路是以金積堡為中心，南路是以河州與狄道州為中心，而輔以西寧；西路則以肅州為中心；其中尤以金積堡的聲勢最大，勢力最強。但這三個回軍中心彼此間的聯繫，則為寧夏將軍署陝甘總督穆圖善所駐紮的蘭州所隔斷，各成獨立作戰之勢。在政略上，左宗棠為免重蹈上次楊岳斌輕進蘭州兵多糧絀的覆轍，力主其原先「緩進急戰」的原則，大軍且戰且耕，一面綏輯難民，一面開辦屯墾，乘時恢復各地的糧食生產。⁸⁹軍事上的次一主要目標，即為寧夏的金積堡，而以自陝北西向進攻的劉松山部為主力，另以其直轄部隊的提督雷正綰、道員黃鼎等部自董志原、涇州西趨固原、鎮原等地，以為側翼支援。⁹⁰金積堡在靈州之南，位於黃河的富饒地帶，為良好的灌溉系統秦渠、漢渠所環繞，地形絕險，易守難攻，其貿易路線可通西北各省及蒙古諸部，擅鹽茶之利；⁹¹事實上，金積堡為一羣堡寨的總稱，其東為吳忠堡，亦為一組堡寨所組成，東至吳忠堡，北至靈州城有堡寨四百五十餘處，其西自老家灘堡，南至秦、漢兩渠合流處的峽口，共有堡寨一百廿處，形勢天成，其中尤以金積堡與吳忠堡為最大和最堅固⁹²。其金積堡本堡又稱馬家灘堡，周九里餘，堡牆高近四丈，厚約三丈，環堡築長堤，高丈餘，下有濠，濠約三丈，北接渠道；且堡中有堡，號稱「王城」，為馬化隆所駐地，其高厚亦如外堡，「其間牆壁縱橫，渠水環複，尺寸皆堅，廣儲槍砲」，糧精

⁸⁸ 同書，奏稿卷卅一，頁十七，董志原戰地的殘破情況，甚為淒涼，左宗棠在奏摺中稱：「遠近城邑寨堡，慘遭殺掠，民靡孑遺，平、慶、涇之間，千里荒蕪，彌望白骨黃茅，炊烟斷絕，被禍之慘，實為天下所無」（左奏稿卷卅一，頁十六——十七）。

⁸⁹ 左集，奏稿卷卅二，頁十下。

⁹⁰ 同書，奏稿卷卅一頁四——二。

⁹¹ 左譜，卷五，頁十。

⁹² 同書，卷五，頁卅九——四十；平回志卷五（回民起義，冊三，頁一六〇）；平定關隴紀略冊九（回民起義，冊四，頁八七——八八）；一八（回民起義，冊四，頁六三）。

充盈，防禦極為嚴密⁹³。馬化隆(龍)又名馬朝清，原任職營弁，世居靈州金積堡，富甲一方，曾捐納為武職；有智略權謀，在地方上有重望，為新派回教之「總阿洪」。回亂前，馬氏本人因犯重案被逮赴省，賴以重賄彌縫得免，陝甘各回族爭致金錢為其贖罪，可見其聲望之隆。⁹⁴回亂發生之後，馬化龍的態度曖昧，非常狡詐，一面大殺漢官漢人，攻城掠地，陝甘回民尊稱之曰「主」，而自稱為「吾雙目」（奴才），馬化龍則自稱為「大總戎」或「兵馬大元帥」，頒授官爵如「參領」、「協領」等。⁹⁵一面則向署陝甘總督穆圖善請求投降，交納出一些羸弱疲敝不堪的戰馬與銹蝕無用的槍械出來，以示「誠意」；此外，一面暗地以馬、械接濟陝回，動以「回教一家」的精神，隱相親附，陝回在陝西所掠得的銀錢財產，則多半運往金積堡存儲；一面馬氏卻常代表清方勸陝回投降，使自己成為居間撮合的中間人；所以，左宗棠自初即認定馬化龍為一最狡獪的敵人，「外雖恭順無異王化，內則暗肆披猖，仍滋他族，」，主張應予斬草除根式的嚴厲懲罰。⁹⁶

劉松山部自同治八年（一八六九）五月，即自陝邊鎮靖堡向寧夏花馬池一帶前進，直指金積堡，利用馬化隆「投降」的說法，名義上宣稱剿辦土匪，實際則為對付馬化隆。⁹⁷馬化隆當然也明白左宗棠對他的意圖，為鞏固其所據有的形勢，一面在內蒙古歸化城等地廣購洋槍、火藥、戰馬等，增強戰備，一面增築防禦工事，廣儲槍砲，以為固守之計。⁹⁸在董志原戰役之前，馬化龍即曾大力以軍火援助該地的回軍，利用駱駝一千五百匹載運糧食接濟；⁹⁹董志原戰役之後，則收留北退的陝回精銳陳林、馬正和、白彥虎、余彥祿等數千人，收編回軍精壯數千人為己部，並收買回馬四千匹，每匹予價三十兩。¹⁰⁰同治八年八月初二日，劉松山軍進抵靈州，進攻陝回馬正和、白彥虎等部，馬化龍則一面出面代陝回求降，一面則幫助陝回抵抗。八月初三日，靈州之南的郭家橋一役，回軍被殺者一千數百名；此後，劉松山軍全力進攻，在不及一個月之內，殺死陝甘回軍共一萬數千人之多。¹⁰¹此外，劉松山軍於抵達靈州附近後，即命令所有擬投降的回軍，必須自左肩至右脇斜

⁹³ 同上註。

⁹⁴ 左集奏稿卷卅二，頁五九下；平回志冊三（回民起義，冊三，頁一一二）

⁹⁵ 左奏稿卷三十二，頁九一；冊卅三，頁七上、五四；左譜冊五，頁十一—十下。

⁹⁶ 同上註。

⁹⁷ 左集，書牘卷十，頁卅六—卅七。

⁹⁸ 左集，奏稿卷三十，頁六六—六七；卷卅七，頁十二。

⁹⁹ 同書，奏稿卷三十，頁六七。

¹⁰⁰ 同書，書牘卷十，頁五二下。

¹⁰¹ 同書，奏稿卷卅二，頁三十。

繫一草繩，以資識別，否則，屠殺無赦。^⑫在這樣壓迫的情勢下，馬化龍才開始撕下其一部份假面具，於同年九月十二日，在其金積堡回人的指揮下，關閉靈州城門，大殺城內漢人十餘萬，全城漢民存者不過數家，所有漢民財產及婦女，均歸金積堡所有，老壯死亡，壯丁為其驅策勞役。^⑬九月十四日，回軍並掘秦渠堤防以灌劉軍。^⑭

但在劉松山軍的銳利攻勢下，回軍節節失利，靈州城於九月廿九日被劉軍克復，著名強悍善戰的陝回陳林、馬正和等部南退金積堡，其所剩能戰者不過數千，而老弱婦孺則不計其數。^⑮當靈州戰事在激烈進行時，河州馬朶三、馬占魁等亦派騎兵數千北上支援、陝回一部則進入甘肅東部的會寧、安定一帶，以與援軍相策應，在金積堡迤南之固原黑城子一帶，與左宗棠直轄的側攻部隊遭遇，苦戰多日，由於左軍裝備有洋槍、劈山砲、洋砲等新式武器，全力轟擊，回軍損失慘重；^⑯且因此批回軍缺乏糧食，軍中多以煮牛皮、茹草子為食，回首馬朶大及陝回崔偉、白彥虎等部乃西竄狄道州，但在該州境內，又被左軍擊敗，該部份陝回乃被迫再西逃至河州，但為河州回軍所拒納，雙方曾發生衝突。^⑰

在此種情形下，劉松山對金積堡的進攻，乃更加緊進行，對於抵抗者常採地毯式的屠殺，不分良莠老少，一律殺光，對於攻克之「破堡內無一漏網之回」。^⑱在克復靈州後之三個月內，共蕩平回人堡寨五十處，回人村落九十餘處。^⑲左宗棠對劉之殺光政策亦予以全力之支持，認為寧夏亂回殺戮漢人極慘，應予痛懲，「失茲不圖，張駿、李元昊之患，必見諸異日」。^⑳但當劉松山本人身先士卒進攻金積堡外圍的馬五寨時，為回軍槍子所擊中，於同治九年正月十五日，傷重而死，雖然馬五寨在此戰鬪中仍為劉軍所攻克。^㉑

劉松山陣亡後，清廷大為震動，而困守金積堡的陝甘回軍則因此勝利而聲勢大振，一面南下圍攻左宗棠直轄部隊提督雷正綰部所占領的戰略要地峽口（位居秦漢

⑫ 平定關隴紀略卷七（回民起義，冊四，頁十九）。

⑬ 左集，奏稿卷卅三，頁十五—十六。

⑭ 同書，奏稿卷卅三，頁二—四。

⑮ 同書，奏稿卷卅三，頁五三下。

⑯ 同書，奏稿卷卅二，頁六六一—七四。

⑰ 同上註，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頁五三〇。

⑱ 平定關隴紀略卷七（回民起義，冊四，頁九、廿三）。

⑲ 左集，奏稿卷卅四，頁六五上。

⑳ 同書，奏稿卷卅三，頁十六。

㉑ 平定關隴紀略卷八（回民起義，冊四，頁五四—五五）；左譜卷五，頁廿九。

兩渠合流處)很快地予以占領,一面陝回在陳林等的指揮下,出奇兵自金積堡向東迅速進入陝北,進攻安邊堡等地,以切斷劉軍的補給後路;⑫同時一部份甘回則竄入陝西渭河北岸,又自渭河北岸南擾渭河南岸的渭南、華州一帶;另一股陝回在崔偉指揮下則自甘肅隴州東進進入陝西鳳翔、岐山境內,在遭遇到抵抗後,即轉而東進至醴泉、高陵境內;加之陝北土匪潰勇也乘機蠢動,到處流竄,人數雖然不多,但對地方的破壞性則仍然甚鉅;⑬使原來已經肅清了的關中地區,又再度受到戰爭的蹂躪,情勢相當危殆,使左宗棠一年半以來剿回的種種努力,大有功虧一簣的可能。

在此危急的情勢下,清廷一方面下嚴旨責備左宗棠與其幫辦軍務劉典貽誤大局,「交部嚴加議處」,另一方面由於戰區蔓延,深恐左軍不能支持,乃旨命李鴻章督辦協剿回軍,命令淮軍勁旅周盛傳、郭松林、唐仁廉等部二萬多人均調往陝西,並預備進一步調遣駐紮直隸的直隸提督劉銘傳部前往,以為後勁。⑭淮軍一部份於奉旨後很快進入了陝北地區作戰,在剿除當地零星的土匪潰勇方面,頗有斬獲,而李鴻章則頗有取左宗棠的總帥地位而代之的可能。⑮左宗棠處此危局,則表現的異常鎮定。他先奏令劉松山之姪在老湘營中轉戰多年的候選道劉錦棠接統其軍而以在該軍中久於服役的提督黃萬友為幫辦,以穩定軍心。劉錦棠雖然年齡只廿餘歲,但英銳饒謀略,輕財而愛衆,能得軍士心,左氏為其請加三品卿銜,以增威望而統御全軍。在劉錦棠的指揮下,圍攻金積堡的戰鬪,仍然加緊進行,並完全切斷甘回所有外來糧道的接濟。⑯劉軍分紮秦漢兩渠河岸,東自吳中堡,西至中衛縣,迤邐達八十里,逐堡惡戰,節節逼進金積堡本堡。另一方面自固原北攻的輔助部隊黃鼎及雷正綰等部亦重整旗鼓,以加強包圍金積堡的態勢。⑰此外,左宗棠則派遣其直轄的精銳部隊一部尾追東竄陝西的陝回,連敗陝回陳林等部於大荔、華州、臨渭等地,壓迫其重新折回甘肅,以避免在陝西遭到全被殲滅的命運;另部左軍則將甘肅東部的寧遠,隴西等地的回軍,掃蕩淨盡。至同治九年(一八七〇)三月,所有東竄陝境的回軍又再度全被肅清,大局才又穩定下來。⑱是年五月,即在

⑫ 李鴻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一,頁五三下;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頁五三三、五三五。

⑬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四,頁卅六下;平回志,卷二(回民起義,冊三,頁一〇二一五)。

⑭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一,頁卅五上、卅七下,卷卅二,頁一上;郭廷以,前書,頁五三四、五三七。

⑮ 前書,朋僚函稿,卷十二,頁十五下。

⑯ 征西紀略卷二(回民起義,冊三,頁卅五)。

⑰ 左集,奏稿卷卅五,頁十一十三、廿九。

⑱ 同書,奏稿卷卅五,頁四一—四四。

此戰局轉機的時候，天津發生了空前嚴重的教案，法國駐紮領事被殺，法領事館教堂及英美教堂均被焚毀，法、俄、英、比、義等國教士修女被殺者廿多人，中法之間的情勢非常緊張。由於負責處理此教案的直隸總督曾國藩年老多病，措置棘手，是年六月，李鴻章即受命自西安前往天津接辦此案，稍後，李氏並繼續曾國藩出任直隸總督；因此，陝甘剿回的重任，始再專由左宗棠負責，西調的淮軍各部也紛紛改調直隸境內。

陝西的局勢重新穩定下來之後，左宗棠即集中全力進攻金積堡，自同治九年（一八七〇）六月九日至廿一日，北路的劉錦棠部與南路雷正綰與黃鼎兩部分別以強大的部隊直攻防守的回軍，在四百餘堡寨中只剩下十一堡尚在回軍之手。^⑩七月廿四日（八、二十）金積堡附近前所失陷的戰略要地峽口為雷、黃兩部所克復，稍後，劉錦棠部並克復金積堡東關。^⑪劉、雷、黃三部均附紮該堡的外圍，將其團團圍困，劉軍專攻其東、南二面，屬劉錦棠指揮的卓軍金運昌部則攻其北面，徐文秀部攻其西面，黃鼎部攻其西南，雷正綰部則專任接應，以防回軍的反撲。^⑫各軍又各以其新式重武器如田鷄劈山砲（迫擊砲）螺絲砲（迫擊砲）及開花砲等向堡內的回軍猛轟，但由於金積本堡係由泥土築成，且房屋皆係平頂，四角微低而所附的泥土甚厚，如砲彈落於街道上爆炸後的殺傷力尚大，如砲彈墜落於屋頂上，則爆炸的鐵片無力；且砲彈的力量亦不能穿透堡牆，僅能在土中爆炸，其破壞力也頗有限。^⑬為增加對金積堡的破壞力，左宗棠乃下令大量利用普魯士製造的「後膛開花大砲」（又名「義耳砲」）連續猛轟七百餘發砲彈，其爆炸力才大為增加。劉錦棠軍之得以連克堅堡，大都賴此。^⑭左氏又採取攻心戰術，派遣降回分赴各堡招降，聲明無盡屠回人之意。^⑮清軍並在金積堡之旁，加築長堤一條，濶三丈，高丈餘，北至黃渠，南至金積堡，長里餘，又開濬深溝以連繫之。^⑯防禦的回軍也裝備有少數的開花砲，曾用以向雷正綰軍射擊，造成相當大的傷亡。^⑰

在左軍的長期包圍猛攻下，回軍表現的一直極為勇悍，在宗教力量的薰陶下，

^⑩ 郭廷以，前書，頁五三九。

^⑪ 左譜，卷五，頁三九一四〇；郭廷以，前書，頁五四二、五四四。

^⑫ 左譜，卷五，頁三九。

^⑬ 同書，卷五，頁四十；左集，奏稿卷卅六，頁六一、六二；卷六七，頁六一七。

^⑭ 左集，奏稿卷三七，頁五一六、十二一三；左譜，卷五，頁卅九一四〇。

^⑮ 左集，奏稿，卷四十，頁十六。

^⑯ 平定關隴紀略卷八（回民起義，冊四，頁六二）。

^⑰ 同書卷八（回民起義，冊四，頁五六）。

各回往往一心作戰，並不求生，於堡寨將被攻破時，各回軍常常先殺其眷屬，然後解衣與清軍格鬪，死而後已。但在戰鬥的最後階段，由於外界糧食的供應完全被切斷了，守軍的戰鬥意志雖然高昂，但全堡存糧日益減少，民間交易麵每斤至二千五百文。最後堡內老弱婦女因飢餓難當，常至清軍營外慘呼救命，堡內則易子折骸，逃生無處，陝回之老弱婦孺餓斃者尤夥。^⑭ 在飢餓的驅策下，金積堡只好先放出老弱婦孺八千多人向清軍投降，稍後，陝回男婦被迫投降者一萬一千多人，其中老弱近九千人。^⑮ 對於作戰的回軍的糧食補給，最初馬化龍對於陝回之能戰而守堡者，尚每日每人發糧一觔，後則漸減，甚至對於其弟馬五馬八所部，亦只每人每日給糧三合；最後則各軍均停發糧食，只有馬化龍及其死黨尚可配給存糧若干，此外，皆以草豔黍根雜牛皮死屍為食，甚至以殺人療饑。^⑯ 堡內回軍的戰馬，在長期的圍困戰中，或在戰鬥中傷死，或被砲火轟斃，或為守軍屠食殆盡，^⑰ 為躲避左軍大砲的轟擊，所有金積堡內的回軍皆穴地而居，以死馬雜旗祭器物堵塞缺口，以為防禦之用；馬化龍所屬勇悍善戰的親軍本有四、五千人之眾，至圍堡末期，生存者不過千餘，而精壯仍可從事戰鬥者不過數百人，然大都皆已體無完膚，飢疲不堪。^⑱ 馬化龍本人也在該堡東門督修堡牆梁時為砲子所傷。^⑲ 最後在糧盡援絕回軍官兵飢餓不堪的情狀下，馬化龍只好於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一、七一、一、六）親自隻身前往劉錦棠軍營投降；陝回悍將余彥祿也率千餘人投降。^⑳ 金積堡本堡的戰鬥雖然告一段落，但附近河西之王家疃一堡，不只堡牆堅厚，且存糧尚多，抵抗戰鬥尚在進行，後由馬化龍遣人前往說降，三天後，才開堡停止抵抗。所有靈州、寧州境內零星的回軍也完全肅清。^㉑ 馬化龍投降所交呈的武器，共計包括車輪大砲四門、九節狸砲四門，威遠砲廿八門，劈山砲廿門，鳥槍一千三十桿，拾槍二百九十三桿，刀矛二千四百一十八件。^㉒ 總計從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八月劉松山進向靈州

⑭ 同書卷九（回民起義，冊四，頁七一、九二）；左集，奏稿，卷三七，頁六十。

⑮ 平定關隴紀略卷九（回民起義，冊四，頁九三）。

⑯ 平定關隴紀略卷九（回民起義，冊四，頁七一、七四、九二）；左譜，卷六，頁二；Wen Djang Chu, *op. cit.*, p. 141.

⑰ 平定關隴紀略卷九（回民起義，冊四，頁九二）；王定安，湘軍記，卷十八，頁廿五下。

⑱ 同上註。

⑲ 平定關隴紀略卷九（回民起義，冊四，頁八五）。

⑳ 同書卷九（回民起義，冊四，頁九一一二）；左譜，卷五，頁四一。

㉑ 左集，奏稿卷三七，頁六十一六四，卷卅八，頁三一四；平定關隴紀略卷九（回民起義，冊四，頁九一一二）。

㉒ 平定關隴紀略卷九（回民起義，冊四，頁九五）。

經略金積堡以來，到同治九年十一月馬化龍投降為止，戰鬥前後延長幾近十六個月之久，左宗棠集中其最精銳的部隊於此，其間戰鬥之猛烈，經營之竭蹶，都可算是西北剿回戰爭中最激烈和最困難的一次戰役，左宗棠自稱：「僕十餘年剃髮平捻，所部傷亡之多，無逾此役者；雖才智鈍拙拮据，不遑顧齒之搖者脫髮之蒼者素矣」。^⑭而在整個戰役中，左軍中堅部隊的老湘營擔任主攻任務，除統將劉松山受傷而死之外，其他提督總兵等高級將領傷亡壘壘；整個老湘營全軍自進軍陝北後，其中下級營官陣亡者達十分之四，兵士陣亡者達一千數百人，傷殘成廢疾者二千多人，其中絕大部份之傷亡均係在進攻金積堡時所致。^⑮

所以，在金積堡克復之後，左宗棠為鎮壓反側，消弭西北地區未來的隱患起見，決施行強硬的鎮壓政策，除下令將金積堡的城壘削平之外，並下令將馬化龍及其親屬的所有財產，完全充公，全部用以獎賞將士及賑濟地方；^⑯另外，左氏也力主對該區域內的叛回嚴予懲處，「殺其首逆」，斬草除根，以將馬化龍及其家族完全消滅，認為「此時若稍鬆手，將來仍是西北隱患，且戎狄之患最難收拾，本（清）朝都燕以九邊為肩背，尤不宜少留根莖，重留異日之憂，不比陝回由積衅私鬪起見，尚可網開一面也。」^⑰因此，左氏在馬化龍投降後，即先遷移馬氏父子兄弟及其親屬於金積本堡濠外各廢堡內，稍後，即授意劉錦棠藉口在金積堡堡牆內掘出馬化龍私藏的洋槍一千二百多枝，違犯了馬化龍投降時不得藏匿軍械的諾言，於同治十年正月十二日（一八七一、三、二、），由劉錦棠親提馬化龍等鞠訊，隨後即將馬化龍父子親屬十三人凌遲處死，所有在馬氏回軍中任官者亦皆處死；而被分置於金積堡附近各廢堡內的回軍悍黨一千八百多人亦全被屠殺。稍過數日，又第二次大屠殺馬化龍的家屬，其中馬氏族人馬玉龍被凌遲處死，其他男犯十五人，眷屬七人，工僕使女卅五人，或即處斬，或發配為奴隸，男犯十歲以上之未成年者則解交北京內務府閹割，十歲以下者監禁俟年達十一歲時再予閹割。^⑱所有在金積堡投降的陝回男婦大小一萬一千多人，均由左宗棠親自點驗，其中老弱婦女約九千人，集中分三批解赴平涼、華亭之間的化平川安插耕墾，其金積堡內之老弱婦孺一萬二千多人則被解赴固原，甘回三千多人亦被解往平涼墾荒生產。^⑲寧夏回民自同治二年大亂

^⑭ 左集書牘卷十一，頁三五—六。

^⑮ 同書，奏稿卷卅九，頁四十。

^⑯ 同書，奏稿卷卅七，頁六四。

^⑰ 左譜，卷五，頁四三。

^⑱ 左集，奏稿，卷卅八，頁廿四—五；書牘，卷十一，頁三四；平定關隴紀略卷十（回民起義，冊四，頁一〇〇—一一）。

^⑲ 左奏稿，卷卅八，頁四一—五。

後經營多年所建立的最堅強最富庶的一個根據地，就這樣被堅決地、無情地、澈底地、乾淨地解決了。

五

寧夏的回軍被勘定了以後，所有甘肅東部平涼、慶陽、涇州、鞏昌、秦州、階州等各州縣的零星土、回各寇，皆已肅清。同治九年六月，左軍又克復了狄道、渭源二城。^⑫左宗棠一方面加緊開辦耕墾，以「耕」代賑，分兵屯與民屯兩種，為糧食生產的儲備，作長期的打算，一面將其軍事指揮的大營自涇州遷往靜寧州，大軍西指，以河州作為次一進攻的目標。^⑬

河州在甘肅的南西部，全境周圍五、六百里，其北、東、西三面均與省城蘭州相毗鄰，與位居其西邊的西寧為漢朝及唐朝時之河湟地方，向為歷代征西戰爭必爭之地。河州居民中漢民只占十分之二、三，回民則強悍好鬪，習於擄掠，馬術尤精，且族類複雜，風俗各不相同，語言亦多達七種。^⑭自同治二年回首馬朶三、馬占鰲以封齋起事造反以來，漢民為其屠戮，玉帛子女，均為掠奪，號稱「從教」；西寧則位居河州之西陲，為番回雜處之區，漢人更少，甘肅回民起而響應陝亂時，當地回人亦起而叛亂，大殺漢人，西寧辦事大臣玉通無力阻止，因此力持安撫政策，先委派回人領袖候選同知馬桂源為署循化同知，同治八年並委其為署西寧知府，又以馬桂源之兄馬本源出任署鎮標游擊，旋並升任署西寧鎮總兵之職，因此回人實際掌握了當地軍政兩方面的權力；馬氏兄弟以假投降來愚弄代表清廷的西寧辦事大臣，又挾政府的名義以控制漢民，「名為官撫回，實為回制官」，回人在西寧可以為所欲為，漢民遭其塗毒迫害，忍氣吞聲，不敢聲訴，馬本源甚至自稱「總領陝湟兵馬大元帥」。^⑮自同治二年之後，多年來陝甘總督均係偏處蘭州一隅，自保不暇，均無法對河州與西寧的叛回稍予軍事上的懲創。^⑯在金積堡戰役中左軍最後合圍前，陝回崔偉、馮得彥、白彥虎等部萬餘人，曾退至河州，後因當地糧價高昂，每斗四十斤價至銀四、五兩，無所得食，乃西走西寧，占據附近的大小金川一帶，

^⑫ 同書，卷卅九，頁卅三。

^⑬ 同書，奏稿，卷三九，頁卅八；左譜，卷六，頁十七一八。

^⑭ 同書，奏稿卷卅九，頁三七一八；平回志卷三（回民起義，冊三，頁一一五）；陝甘劫餘錄（回民起義，冊四，頁三一〇一一）。

^⑮ 左集，奏稿卷四二，頁廿九一三十。

^⑯ 同書，奏稿卷卅二，頁九上；卷卅九，頁卅七一一八。

與河州、西寧成崎角之勢，互相聲援，但河州回與陝回之間的衝突，也常發生。^⑭

左宗棠軍在進攻河州前先準備好三個月的糧食馬料，並準備了各項造橋器材，以備渡河窮追。^⑮同治十年十二月至同治十一年元月之間，激烈戰鬥在河州城附近的太子寺展開，在回首馬占鰲的指揮下，曾連續大勝兩次，左軍有兩名提督及多名總兵在戰鬥中陣亡。但左宗棠並不氣餒，復振奮士氣，集中大軍，以圖再舉。^⑯在左軍沈重的壓力下，馬占鰲（馬朶三已經於同治十年三月病故）深感戰事無望，決定向左氏投降，由左軍前敵總統前浙江按察使王德榜初步答應接受；左宗棠也鑒於河州回民衆多，馬占鰲立身行爲頗具俠義精神，改持對當地回民的安撫政策，但他堅持降回應「盡交馬械，盡歸約束」及投降後「遷徙回民不令與漢民雜居」的兩項原則，並力主對於「土回之叵測者，陝回之觀望者」痛予剿洗。^⑰雙方的談判，至同治十一年四月十日（五、十六）達成協議，規定所有河回馬占鰲、馬朶三等部均向左軍投降，呈交所有馬械，包括戰馬四千多匹，槍矛一萬四千餘件；附近駐紮的陝回一部份亦降；同年五月，左軍即進駐河州城。^⑱對於投降回軍的善後問題，左宗棠在河州是比較寬厚，他主要的著眼點是想在回亂平定後籌謀回漢之間的永久和平，所以反對冤冤相報，主張以公正的立場來處理大亂後諸善後問題；所以，他力主將漢、回分別徙置，彼此互成社區，和平相處。由於河州當地原即回多漢少，左宗棠乃極力安撫當地的回民，而將當地及外來的漢民徙置於狄縣、金縣、安定、會寧等縣近城驛及交通要道之地，以策安全，而形成漢人聚居的新聚落區；對於回民的安插，則根據「煥其羣，孤其勢」的原則，分其爲甘回與陝回兩部份，甘回則盡量留置當地，而將陝回移置於安定、會寧、平涼、隆德、靜寧等州縣境內數百里無人烟之區。^⑲由於馬占鰲在投降後，對於協助剿平殘餘的叛回甚爲賣力，左宗棠並專摺奏准給予花翎五品頂戴的官銜。^⑳

河州的戰事告一段落後，左宗棠即進駐蘭州，指揮和通籌整個關內外西北回亂的各項問題，一方面即以劉錦棠的老湘營爲主力，迅速地乘勝向西寧進攻。當時劉錦棠適於同治十一年六月自湖南招募了步兵三營及騎兵兩批返防，使老湘營增加了新

⑭ 同書，奏稿卷卅三，頁六六；卷卅九，頁卅七；左譜，卷六，頁廿六。

⑮ 左集，奏稿卷卅九，頁十七、三十；卷四一，頁六八—九。

⑯ 同書，書牘卷十一，頁六一；郭廷以，近代中國史事日誌，頁五六〇。

⑰ 同書，書牘卷十二，頁廿五上，四十五上。

⑱ 同書，奏稿卷卅九，頁卅九上；卷四十一，頁三六一七、六一—二；書牘卷十二，頁卅一。

⑲ 同書，奏稿卷四一，頁六二—三、九一；書牘卷十二，頁卅一上。

⑳ 同書，奏稿卷四三，頁七。

的生力軍，全軍十四營約八千人，兵額充足，再加輔助的客軍四營二千五百人，再加經過了金積堡戰役後較長期的休息整頓，這支一萬多人的部隊無論在戰力與士氣方面，均達到一新的巔峯。^⑭因此，在戰鬥開始之初即表現出攻勢銳利的特色。左宗棠的既定戰略是先進攻占據大小金川以陝回禹得彥、白彥虎等部，然後再對西寧土回馬本源、馬桂源兄弟施以最沈重的打擊。^⑮

戰鬥自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八月開始。馬本源兄弟先表示願意投降，但要求左軍驅逐盤踞附近的陝回。左宗棠則堅持西寧叛回不能援引河州降回先准投降後交馬械的前例，必須嚴予部勒，在「馬械不悉數呈交，匪類不悉數網獻」之前，當堅持「一不做，二不休」加強進攻，並毫不留情的予以屠殺。他在致前敵總統各軍的前山西按察使陳湜函中說：

「撫之一說，不宜太急，馬械不悉數呈交，匪類不悉數網獻，終非了局，諺云：「一不做，二不休」，又云：「耽遲不耽錯」，兩語請留意，勿為浮議所搖，幸甚幸甚。……河湟（即西寧）之事，辦法須細鉅密縷，亦宜長槍大戟，兩者不可偏廢。從前大東鄉因誅戮稍少，遂不免重煩兵力，現在西寧之於土客各回，均不免恩多威少，將來流弊滋多。來書縱窮而乞撫，亦必重繩以法，寧耽延時日，終不敢規之目前，足見謀國之忠，亦理勢之自然也」。^⑯

劉錦棠則想利用馬氏兄弟談判投降的機會，迅速進軍，以先攻陝回白彥虎部的根據地高家堡。戰鬥自八月十七日展開後，雙方苦戰多日，劉軍則利用其配備的車輪大砲攻擊，一次即連放卅餘砲，殺傷力相當大，回軍先後被殺被擒者一千數百人，白彥虎本人也受了傷。^⑰在此戰鬥中西寧土回則參加了陝回方面以與劉軍相抗，因此，洽降的談判，完全破裂。^⑱劉軍在此戰鬥進軍中通過地勢最為險要的大峽小峽地區，以直趨西寧城，該地區延長八十餘里，號稱「湟中」，兩岸峭壁高聳，聯綿不斷，當時已是舊曆十月的天候，西北高原上的冬季早臨，多有霜雪，劉軍以南方健卒而沿此地峽銳進六十餘晝夜，其間廿餘夜均未曾紮營收隊，將士露立於冰寒中，相當艱苦，沿途經過大小五十多次戰鬥，才於同治十一年十月中旬進抵西寧城下。^⑲

^⑭ 同書，奏稿卷四一，頁七七上；卷四二，頁十六上。

^⑮ 同書，書牘卷十二，頁四三下。

^⑯ 同書，書牘卷十三，頁七一八。

^⑰ 同書，奏稿卷四二，頁十二一七；十八，四二一三。

^⑱ 同書，奏稿卷四二，頁十二一七。

^⑲ 同書，書牘卷十二，頁六四一五；平定關隴紀略卷十一（回民起義，冊四，頁一五九）。

劉軍先攻擊西寧城外的東關。因馬桂源率軍出城與劉軍鏖戰，城內漢民即乘機控制全城，閉門堅守。因此，劉軍於十月十九日即於擊敗回軍後，進而開入西寧城，解救出城內為回軍擄掠脅制的漢民老弱三萬多人，馬本源兄弟則逃往該城西南之東川巴燕戎格。^⑩劉錦棠軍跟蹤追擊，在同治十一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之間，在大通附近與回軍連續發生激烈的戰鬥，擒斬回首多名，鹵獲騾馬、糧料、槍枝甚多。^⑪劉軍又深入東川，於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四日攻占巴燕戎格，生俘馬桂源、馬本源。陝回勁旅崔偉、禹得彥等部丁壯老弱婦女二萬多人亦在劉軍的武力脅制下，伏地請降。只有白彥虎率其悍黨及眷屬二千多人冒死逃出重圍，循永安山草灘一帶向西竄往甘州，最後更再西行越過玉門關外的沙漠地帶，進入新疆北部。^⑫西寧附近為回番雜處的邊陲地帶，自道光十年（一八三〇）左右即實際為回人所控制，至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初為劉錦棠部收復，平定亂回，為時已達四十餘年之久；即自同治初年當地土回正式響應陝西回亂以來，為期亦達十年；至此才算恢復為清廷所統治。^⑬

總計自金積堡戰役結束後，劉錦棠軍養精蓄銳休養整補一年八個月之久，才開始發動進攻西寧之役，而在短短七個月的攻勢戰鬥中，即將該區回軍消滅淨盡。^⑭不過，與在河州所推行的安撫政策完全不同，左宗棠在西寧處置諸叛亂回首的手段是極為嚴厲的。在他親自的審訊下，馬本源、馬桂源兄弟均被凌遲處死，並且梟首示衆；其弟馬楨源則被斬決而免梟示。所有馬氏兄弟的兒子廿一名，均解往北京內務府閹割，然後發往新疆為奴，其眷屬妻女則發往福建、廣東之駐防軍所為奴。^⑮陝回降衆除收編其一部份精壯隨同左軍作戰外，其餘約二萬人則分批被押解往平涼、秦安、清水等地安插耕墾，編入戶口，予以極嚴厲的管制。^⑯

六

左宗棠征討陝甘回亂最後的一項重大戰役為克復西路的肅州。

肅州古稱酒泉，位居新疆與西北內地之間交通往來的必經之道，歷代向為西北

^⑩ 左集，奏稿卷四二，頁三十、七八上；書牘卷十二，頁六六。

^⑪ 同書，奏稿卷四三，頁二。

^⑫ 同書，奏稿卷四三，頁廿二，卅八一四五。

^⑬ 同書，奏稿卷四三，頁廿二—三，四八一五一，書牘卷十三，頁七下。

^⑭ Wen-Djang Chu, *op. cit.*, p. 148.

^⑮ 左集，奏稿卷四三，頁廿三，四八一五一；書牘卷十三，頁七下。

^⑯ 同書，奏稿卷四三，頁廿二。

邊防的重鎮，為兵家所必爭。所以，其城池堅固，城高三丈六尺，厚三丈多，城牆外環以深濠，深二丈多，濠約十丈，濠外則分設卡隘，另置有堅固的堡壘，以為守城的輔助據點。^{①67} 陝西回變發生後，同治四年（一八六五）二月，肅州城及其附近的戰略要地嘉峪關，即為回首馬文祿所竊據，響應寧夏馬化龍的起事，反抗清政府，稍後，並接受關外烏魯木齊回教阿渾清真王妥得麟之封，自稱元帥。馬文祿初名馬忠勇，又名馬四，原為西寧獵戶，所部回軍強悍善戰，以撒拉回番及河州西寧一帶的土匪為主，數達二萬多人，中間雖曾一度向陝甘總督投降，但實際只是藉此脅制官長，其殘殺漢民蹂躪地方的行為，並未停止，^{①68} 故在其一度請降時肅州城內本尚有漢民三萬多人，此後歷經馬軍的殘殺，精壯死亡，婦女被擄，至亂事平定後全城竟只剩下老弱男婦一千一百多人而已。^{①69} 馬軍並在城內屯積糧食，足敷年餘之用，以為戰守的準備。^{①70}

事實上，左宗棠遠在進攻河州之前，即於同治十年七月派遣川軍提督徐占彪率馬步十二營由靖遠取道蘭州、涼州、甘州進攻肅州。^{①71} 徐軍裝備有新式的後膛螺絲大砲多門，可用以攻堅及遠，再輔以新式的洋槍，施放迅速而不畏風雨，而防守肅州的回軍則只佩有舊式的叉子槍及刀矛，不只火藥施放的速度緩慢，其所用的繩藥常因雨濕而失效。徐軍抵達肅州城外後，即發動攻擊，以開花砲轟擊城外西南的塔爾灣堅堡；回軍不知新式槍砲為何物，竟認此為「妖術」，集中軍隊五、六千人之多，均穿戴白衣白巾，前面綴以黃花，斜排兩行，中排方營，後則散隊，成所謂「喪門陣」以對抗。在其將進攻時，先殺一婦人及一狗於陣前，以破「妖邪」。然後全軍狂呼攻擊而前；在徐軍的迎頭痛擊下，因此，損失甚大。^{①72} 不過，由於肅州城大地廣，城池堅固，徐軍只有六、七千人的兵力，不敷分配，自然無法作有效的進攻。所以，戰事一直拖延下來，無法取得決定性的勝利。^{①73}

稍後，由於河州方面的戰事非常順利，進攻西寧的戰鬥亦進展良好，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左宗棠乃增派馬隊三營、步兵二營增援徐軍；同年十二月，原駐靈州一帶的寧夏將軍金順所部二十營亦抵達肅州城北，圍攻的軍事行動始迅速增強。次年

^{①67} 平定關隴紀略卷十二（回民起義，冊四，頁一七七）。

^{①68} 平回志卷三（回民起義，冊三，頁一〇七、一二一）；左集，奏稿卷四一，頁六九下；卷四四，頁八

^{①69} 左集奏稿卷四一，頁六九下，卷四四，頁八下。

^{①70} 同上註。

^{①71} 左集奏稿卷卅九，頁五四—五五。

^{①72} 同書，奏稿卷四一，頁八一—二。

^{①73} 同上註。

四月，原駐綏遠河套一帶的湖南提督宋慶也率軍抵達肅州，在左宗棠指揮下目標指向肅州的進攻部隊雲集，共達馬步六十多營三萬多人。^{①74}左氏顯然想在此關內討回的最後一次主要戰役中顯示其軍事上的實力，以為進一步征討關外新疆的軍事行動作一次準備工作。

左軍的大規模進攻，仍然以砲轟為先導，其辦法是以後膛砲轟擊城牆，而以劈山砲（迫擊砲）攻擊城內及守城的回軍。徐占彪並在肅州城外西南角構築砲臺，其高度與城垣相等，每臺安置大砲兩門，砲臺周圍挖掘水溝兩道，每溝深約五尺，寬約六、七尺，溝旁駐有衛護砲臺的軍隊，每天即以大砲轟擊城壕。^{①75}金順軍則另在肅城外之東北角挖掘地道，準備以地雷炸城。^{①76}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五月後，攻城戰鬥加緊進行，六月初一日，徐軍大砲連放一百五十砲，轟坍肅州城上女牆七處，城外磚石護牆三丈餘；次日，再轟一百廿砲，砲轟之後，則繼之以步兵衝鋒，但屢次均為防守的回軍擋回。六月十六日，再砲轟一百二十砲，轟坍了寬約六、七丈，高約七、八尺的一段城牆，但因城牆為深濠圍繞，回軍死力防守，左軍仍然無法飛渡。^{①77}為加強砲轟的效果，左宗棠並命令負責製造供應砲槍彈藥的蘭州機器局監督副將賴長及另一新式槍砲專家副將鄧增，親自管帶該局最新式的後膛大砲及該局所有儲存之砲彈一千五百多發悉數運至肅州前線，用以轟城，開砲前後達二千四百餘發以上；^{①78}另又用洋槍輔助射擊，將肅州城西南角轟坍七十餘處，城外磚石亦多塌卸，但左軍雖然在六月六日攻克東關，徐占彪本人亦在衝鋒時身受重傷，但左軍仍然無法衝進城內。^{①79}

在攻勢陷於頓挫的情形之下，左宗棠於結束了西寧戰役後的許多善後事項之後，於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八月十二日親自抵達肅州城外督戰，命令金順、宋慶兩軍合攻城東北角，徐占彪軍專攻西南角；他除去親自督導加緊用砲轟城之外，又命令以開花大砲向城內作面積廣大的縱深轟擊，擴大其殺傷力，並命令加緊挖掘地道，以繼續從各個方向用地雷轟坍城牆。^{①80}左宗棠並命令在西寧投降的陝回崔

①74 左集，奏稿卷四三，頁十五、十七、二十、六三；卷四四，頁四十。

①75 同書，奏稿卷四三，頁五下，卷四四，頁二七一—三十。

①76 同書，奏稿卷四三，頁七四，卷四四，頁五一—十七。

①77 平定關隴紀略卷十二（回民起義，冊四，頁一七〇）。

①78 同書卷十二（回民起義，冊四，頁一八一）；左集，奏稿卷四三，頁六三；左譜卷六，頁十六。

①79 左集，奏稿卷四三，頁七三；書牘卷十三，頁廿六一—七；平定關隴紀略卷十二（回民起義，冊四，頁一八三）。

①80 平定關隴紀略（回民起義，冊四，頁一八五—一六）；左集，奏稿卷四四，頁五一—八。

偉、禹中海等到城下喊話，要求馬文祿投降。^⑩是年九月十日，劉錦棠亦率其老湘營勁旅五營，前來增援。左軍的士氣更增，而圍攻的行動也更加強了。^⑪

在肅州防守的回軍方面，經過了兩年多的遭受圍困之後，連續作戰，不只在兵力上損失重大，兵數日益減少，其後雖然得到玉門關外回軍馬振（正）國部的來援，但在總實力上亦無法與左宗棠進攻大軍的三萬多人相比較。^⑫加之原有的存糧漸漸食盡，新的糧食來源又被左軍完全截斷，守軍漸漸處於糧食不足的困境。自同治十二年三月以後，回軍已開始將戰馬與所畜養的牲畜中之疲弱者宰食，藉以充飢；其後糧食供應的情況更差，飢餓的情形更爲嚴重；^⑬最後，馬文祿只好像馬化龍一樣，在同治十二年九月十五日親自向左宗棠開城投降，答應交出所有的武器與馬匹，計共叉子槍一千一百七十餘支，劈山砲、狗頭砲、過山鳥槍、抬槍等數百件，矛千餘件，但馬匹因多被宰食，投降時交出者則只有七十餘匹。^⑭從回軍所交砲械的數量不多，卻面對着左軍精銳近四萬人的圍攻，前後堅守達兩年兩個月之久，可以想見肅州回軍戰志的旺盛與戰力的堅韌了；而此役雙方戰鬥的猛烈與規模，實爲在整個陝甘回變中僅次於金積堡之役的第二大戰役。而左軍在圍攻過程中所遭受的損失，亦相當重大。計徐占彪軍戰死者五百多人，受傷者則達二千四百多人，宋慶軍傷亡合計亦近千人，病故者數百人，金順軍陣亡及受傷者亦計有數百人。^⑮

左宗棠對於馬文祿的頑抗，非常痛恨，這次又再度一反在河州接納馬占鰲投降及在西寧接納陝回崔偉等投降的較寬大的態度，改而採取一種極嚴厲而澈底乾淨地的屠殺政策。在回軍交械投降之後，他即命令所有城內籍隸甘州者出東門交宋慶點驗，籍隸嘉峪關外沙州者亦出東門交金順點驗，籍隸西寧河州、循化、陝西者出南門，由劉錦棠、徐占彪點驗。點驗完畢後，九月廿三日，即在馬文祿投降後的第八天，左宗棠乃宣布要親自訊審馬文祿及諸投降回軍首領，當場將馬文祿等九人凌遲處死。在中軍號砲三響的指揮下，各軍同時行動將所有點驗登記投降的甘、陝各回軍一、五七三人，悉數予以屠殺。當天夜間，各軍並進入肅州城大肆屠殺，所有肅州殘餘回民五千四百餘人除六十歲以上及十五歲以下的老弱婦女九百多人之外，其

⑩ 左集，奏稿卷四四，頁五一—八。

⑪ 同上註。

⑫ 左奏稿卷四三，頁六三。

⑬ 同書，奏稿卷四三，頁四四；平定關隴紀略卷十二（回民起義，冊四，頁一七四）。

⑭ 左集，奏稿卷四四，頁五一—八。

⑮ 同書，奏稿卷四四，頁四十一—。

餘全遭屠殺淨盡；^⑧ 卽此遺留的九百多老弱婦女及城外降回共計二千數百人亦全被移往蘭州耕墾。所以，左宗棠在所上奏摺上卽說：「現在肅州無一回羈雜，其甘州、涼州各回，死亡殆盡，亦無遺種」；^⑨ 另在致友人沈葆楨函中也說：「酒泉（肅州）踞逆一掃而盡，關內外花門種族悉掃而空，亦千數百年希有之事」，當係實情。^⑩

肅州戰役是左宗棠平定陝甘回變過程中最後的一次重大戰役，從此，嘉峪關內所有回亂乃全被蕩平。從左氏被調往陝甘總督於同治六年（一八六七）五月率軍抵達陝西，中間經過緊急性的決定率軍東行追逐東竄入晉、直、魯等省境內的捻軍，實際左宗棠開始有步驟的進攻陝甘回軍，應該自同治七年十月他在平定捻亂後返回陝西西安開始。從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十月至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九月肅州戰役結束，他費了整整五年的時間，才將陝甘回民的叛亂用武力完全消滅。下一個步驟卽是西出玉門關以討平天山南北路的回亂了。這件增援玉門關外殘存的清軍及進一步收復關外失土的重要任務，左宗棠初僅奉命負責轉運糧餉及一切補給，稍後才被命負責整個收復失地的軍事指揮及新疆善後行政的所有事宜。^⑪ 在這方面，和他平定關內的陝甘回亂一樣，他做的仍然非常出色，達到了收復新疆綏定邊陲的目的。

^⑧ 同書，奏稿卷四四，頁五一—八。

^⑨ 同書，奏稿卷四四，頁卅一。

^⑩ 同書，書牘卷十三，頁三十。

^⑪ Wen-Djang Chu, *op. cit.*, pp. 163-196; and Wen-Djang Chu, "Tso Tsung-tang's Role in the Recovery of Sinkiang, *Tsinghw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Vol. 1, No. 3 (September, 1958), pp. 136-167.